

唐宋八大家文集

郭预衡 主编

詩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於東山
之上徘徊於斗牛
之間白露橫江水
光接天縱一葦之

唐宋八大家文集

郭预衡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444173

苏洵文

熊宪光
评注

42

序 言

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有一位这样的作家：他唯独不具进士出身资格，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作过卑微的小官，始终以“布衣书生”自居，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所存文章仅有百余篇，在八大家中数量最少，但却能以其鲜明的特色和卓越的成就屹然自立，不仅身前就已名满天下，而且身后更被奉为一代文豪，与其二子并占八大家之三席。他，就是杰出的散文家苏洵。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亦称老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享年五十八岁。

苏洵少时游荡不学，至二十七岁始发愤攻读，登上科举仕进之路。然而他先后两次举进士不中，至庆历六年（1046）三十八岁时赴京举“茂材异等”又不中。其时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多被贬逐。苏洵目击时艰，既为国家前途渺茫而失望，又为自己仕路不通而灰心，于是“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苏洵《上韩丞相书》）。从庆历七年（1047）举制策不中返家之后，“一顿饿十年”（苏洵《忆山送人》）。十年之间，“益闭户读书”，“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欧阳修《老苏先生墓志铭》），不仅思想发生了

质的飞跃，而且为文也进入新的境界。他将先前应付科举考试而作的文章“数百篇”付之一炬，“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直至学贯古今，豁然开朗，“涵蓄充溢”，不得不发，始如泉涌江流，随意为文。苏洵一生的重要文章，如《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便都写成于至和二年（1055）前的三四年间。

嘉祐元年（1056），苏洵送其二子苏轼、苏辙赴京应试。其时正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要人重又入朝用事，苏洵于是满怀希望，向欧阳修呈交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和雅州知州雷简夫的推荐信，并上书献文，博得欧公赏识，“目为孙卿子”，特向朝廷上《荐布衣苏洵状》，极力推荐苏洵。由于欧公的奖掖，“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其二子举进士又都在高等，一时间，苏氏父子“名动京师”，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

正当苏氏父子蜚声天下，踌躇满志之时，忽传噩耗，苏洵之妻程氏于嘉祐二年（1057）四月病故于家。父子三人于是仓促离京返川治丧。至嘉祐三年（1058）冬，朝廷始下诏命，召苏洵赴阙应试。苏洵不满于朝廷办事的拖拉，又为自己不受信任深感愤慨，便于十二月一日上书皇帝，表示谢绝。次年六月，诏命再下，苏洵乃携二子及全家大小赴京。直到嘉祐五年（1060）八月，苏洵五十二岁时，才被任命为秘书省试校书郎，职低而位卑。他对此深表不满，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次年七月，因太常修纂建隆以来（即北宋开国以来）礼书，他才被授以霸州文安县主簿，使食其禄，而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职位依然卑微。治平三年（1066）四月二十五日，苏洵病故于京师。

苏洵一生，“书虽就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并口号》），其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没能在政坛上大展“王佐才”，成为“帝王师”，却在文坛上光芒四射，赢得了古文“大家”之名。

二

苏洵以一介布衣的身分步入文坛。作为杰出的散文家，其文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特色。

特色之一是务出己见，勇于创新。

苏洵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而言”，鄙弃因袭，贵在独创。他称赞欧阳修的文章“断然自为一家之文”，所谓“自为一家”，其实也是他自己为文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他“务一出己见，不肯蹈故迹”（曾巩《老苏先生哀词》）。这一特点，在其所作政论文中表现最为突出。如《几策》中所提出的“尚威”而用“强政”的政治方针，《权书》中所论述的见解独特的战略战术思想，《衡论》中所发表的一系列政治革新主张等，都是确有心得之论，不乏独到之见。尤为突出者是其所作《六经论》。作者本着切于人事、通于人情的精神而论“六经”，提出了不少颇富独创性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以致为正统儒家所不容。刘大櫆在称其“行文雄放”的同时，还不忘斥之为“不根之谈”。这倒恰好从反面说明了苏洵为文不愿蹈踪古人，而勇于创新立说的一大特点。

特色之二是非特能文，更重用世。

“位卑未敢忘忧国”，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之一。苏洵堪称表率。他生当北宋中叶，王朝“积贫积弱”，危机四伏。对外奉行“斥地与敌，守内虚外”的屈辱政策，甘愿向辽和西夏割地纳贡，以求苟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对内则纵容官绅豪强肆行兼并，残酷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真是“虽号百岁之承平，未尝一日而无事”（苏洵《贺欧阳枢密启》）。当此内忧外患深重之际，苏洵“皇皇有忧天下心”（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第十五》）；故其为文，重在“施之于今”。无论是言兵论战、评说古今形势的《权书》，还是指陈时弊、提出政治革新主张的《衡论》，以及关于国家长治久安大政方针议论的《几策》等等，都

不只是令人叹赏的佳妙之作，更是“施之于今，无所不可”的有用之文。正是这一特点，使之迥然不同于纸上谈兵的“天下之士”。《权书·孙武》篇最为突出地表现了苏洵在“言”与“用”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更重后者的思想倾向。正是本着贵用的观点，苏洵肯定孙武只是“言兵之雄”，而非用兵之雄；批评其“不能自用”，以致功少而失多。经世致用的思想如一条红线，贯串了苏洵的文章。正如欧阳修在《荐布衣苏洵状》中所称道：“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

特色之三是文贵自然，简切平易。

苏洵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以风水相激而自然成文为喻，形象地表达了“文贵自然”的主张。他把“风行水上”似的自然而然之文，奉为“天下之至文”，并在写作实践中，力图攀达这一境界。其为文往往随意而发，但“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如著名的《木假山记》、《送石昌言使北引》、《苏氏族谱亭记》、《彭州圆觉禅院记》等，莫不如此。尤为典型者是《名二子说》。此文不计标点仅87字，专就轼、辙二字之义发论，分别据其特点并联系人的个性为说，表达了自己对二子的担心和希望。文章就名论名，看似自然、随便，但富于形象，深含规勉，无愧为一篇言简意深、语短情长的诫子之说。值得一提的是，现存苏洵之文，多为短制，少有长篇。除《上皇帝书》因系统陈说政见，“条为十通”，洋洋洒洒五六千言外，其余大多在千字左右。当然，短未必就佳，但苏洵之文皆有为而作，无不简切精悍，平易自然。正如曾巩在《老苏先生哀词》中所评：“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唯其不得已而言，自然成文，简切平易，方可达到挥洒自如的艺术境界。

特色之四是学杂纵横，博辩宏伟。

纵横为乱世之学，战国时期曾风靡一时，至战乱的秦汉之际，也颇时兴了一阵子。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纵横之学便被视为异端邪说，为正统儒家所不齿。然而苏洵却独持己见。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的赞赏之情，公然宣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谏论（上）》）他盛赞游说之士的“机智勇辩”，并奉战国纵横之说为楷模，总结出“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为纵横之说大唱赞歌。不仅如此，他还在《利者义之和论》中大胆言“利”，宣称义与利实不可分，甚至“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明确主张“义利、利义相为用”。这样的义利观，与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说格格不入，倒是与公开宣扬“争利”的战国纵横家心气相通。如此为纵横家张目的惊世骇俗之论，在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的封建时代，无异于“畔经离道”之言。难怪当时即受到王安石的非议，断然指斥“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第十四）。后世文人如茅坤、方苞等也曾明白指出苏洵之学杂出战国诸子，言外之意即贬其思想不够“纯正”。现在看来，苏洵学杂纵横无可讳言，但所谓“杂”，其实正表明苏洵的思想较为开放，并且颇有敢于反传统的倾向。这是与苏洵身为草野布衣，思想较少束缚，因而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放言无忌分不开的。

苏洵学杂纵横，文章亦具纵横之风。其文纵横驰骤，气势磅礴，恣肆酣畅，雄辩滔滔，在在活现战国策士之辞的风神。欧阳修称其文“辞辩宏伟”（荐布衣苏洵状），曾巩赞其文“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老苏先生哀词》），张方平夸其文“如大川之滔滔”（《文安先生墓表》），都充分肯定了苏洵文章的这一突出特点。

三

本书共选文 91 篇，约占苏洵今存文章的百分之八十，反映了老苏之文的基本面貌。选文主要据《全宋文》，参以西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藏清康熙邵仁泓安乐居刻本《苏老泉先生全集》和四部丛刊及四部备要本《嘉祐集》，勘正了若干文字错、漏。标点均经斟酌，并按己意加以分段。选文大致按文体分类，依写作先后次第编排。

曾枣庄先生的大作《苏洵评传》对本书的选注助益良多，谨此深表谢意。此外，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李弘毅兄在图书资料方面给我提供了诸多帮助，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由于选注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选、点、分段未必尽妥，解題、注释更难免有误，诚望专家、读者惠予指正。

熊宪光

1995年9月23日

于西南师范大学亦说居

目 录

序言	熊宪光 (1)
策论	(1)
几策	(1)
审势	(1)
审敌	(8)
权书	(16)
权书叙	(16)
心术	(18)
法制	(22)
强弱	(25)
攻守	(29)
用间	(34)
孙武	(37)
子贡	(41)
六国	(44)
项籍	(47)
高祖	(51)
衡论	(55)
衡论叙	(55)
远虑	(57)
御将	(63)

任相	(67)
重远	(70)
广士	(74)
养才	(78)
申法	(81)
议法	(85)
兵制	(89)
田制	(94)
论辨	(98)
六经论	(98)
易论	(98)
礼论	(102)
乐论	(105)
诗论	(108)
书论	(111)
春秋论	(114)
洪范论	(118)
洪范论叙	(118)
洪范 (上)	(120)
史论	(124)
史论引	(124)
史论 (上)	(126)
谏论	(129)
谏论 (上)	(129)
谏论 (下)	(134)
制敌	(136)
管妃论	(139)
管仲论	(143)

明论·····	(147)
三子知圣人汙论·····	(150)
辨奸论·····	(153)
利者义之和论·····	(157)
奏状 ·····	(160)
上皇帝书·····	(160)
议修礼书状·····	(175)
书启 ·····	(179)
上府倅吴职方书·····	(179)
上张文定公书·····	(185)
谢张文定公书·····	(189)
上韩枢密书·····	(192)
上富丞相书·····	(197)
上文丞相书·····	(201)
上田枢密书·····	(205)
上余青州书·····	(209)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213)
上欧阳内翰第二书·····	(218)
上欧阳内翰第三书·····	(221)
上欧阳内翰第四书·····	(223)
上欧阳内翰第五书·····	(226)
上王长安书·····	(228)
上张侍郎第一书·····	(230)
上张侍郎第二书·····	(233)
上韩舍人书·····	(235)
与吴殿院书·····	(237)
与梅圣俞书·····	(239)
答雷太简书·····	(241)

与杨节推书·····	(243)
谢赵司谏书·····	(246)
上韩丞相书·····	(248)
上韩昭文论山陵书·····	(251)
谢相府启·····	(256)
贺欧阳枢密启·····	(258)
与孙叔静帖·····	(260)
送吴侯职方赴阙引·····	(262)
送石昌言使北引·····	(265)
说记·····	(268)
仲兄字文甫说·····	(268)
名二子说·····	(271)
苏氏族谱亭记·····	(273)
族谱后录上篇·····	(276)
族谱后录下篇·····	(280)
张益州画像记·····	(285)
老翁井铭·····	(289)
彭州圆觉禅院记·····	(291)
木假山记·····	(293)
极乐院造六菩萨记·····	(295)
王荆州画像赞·····	(297)
吴道子画五星赞·····	(299)
祭文志铭·····	(302)
祭亡妻文·····	(302)
祭史彦辅文·····	(305)
祭史亲家祖母文·····	(308)
祭侄位文·····	(310)
丹棱杨君墓志铭·····	(312)

○ 策 论

几 策

审 势

【解题】

《几策》是苏洵的重要政论之一。“几”一作“机”，指为政的关键、要点。“策”即策论，一种政论文体。“几策”即关于国家长治久安大政方针的议论。包括《审势》、《审敌》二篇，大约作于北宋仁宗朝皇祐末至和初（公元1054年前后）。时当北宋中叶，王朝“积贫积弱”，危机四伏。对外奉行“斥地与敌，守内虚外”的屈辱政策，甘愿向辽和西夏割地纳贡，以求苟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对内则纵容官绅豪强肆行兼并，残酷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当此内忧外患深重之际，作者认真总结了对辽和西夏战争失败的教训，针对现实的政治状况，“作策二道”，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审势》篇论治国之要首先应“定所尚”，即制定好带根本性的指导方针；而要“定所尚”，就必须“审势”，即研究当前形势，明察所存在的问题，弄清“天下之病”而对症下药。否则宽严皆误，必有亡国之忧。文章引古论今，鞭辟入里；取譬设喻，酣畅明晰，雄辩地说明了为政必先审势这一中心论点，鲜明地提出了“尚

威”而用“强政”的政治主张。

治天下者定所尚^①。所尚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②，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于是，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视天下之所宜尚而固执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

周之世，盖有周公为之制礼^③，而天下遂尚文。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④，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计，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⑤。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尚者，而愚犹有感也^⑥。何则？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⑦。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⑧。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为德^⑨。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慄^⑩。故威与惠者，所以裁节天下强弱之势也^⑪。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⑫。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将欲乳药饵石以养其生^⑬，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阴，药石之阴而投之阳，故阴不至于涸^⑭，而阳不至于亢^⑮。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

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

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太盛。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①，其势为弱。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无不在我，其势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②，诸侯无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势未见于外^③。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区区守姑息之道^④，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势，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秦自孝公，其势固已駸駸焉日趋于强大^⑤。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挞平民。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秦勇于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⑥，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⑦，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⑧；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何谓弱之实？曰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多赎数赦^⑨，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胡强盛^⑩，陵压中国，而邀金缗、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大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今夫一舆薪之火^⑪，众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

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②。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③，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④，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欲为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慄。然则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

或曰：当今之势，事诚无便于尚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邪？愚应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为君也。一日而无威，是无君也。久而政弊，变其小节，而参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举而弃之，过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夫汤、武皆王也^⑤，桓、文皆霸也^⑥。武王乘纣之暴^⑦，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⑧，苟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则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礼义。彼汤则不然。桀之德固无以异纣^⑨，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风，淫惰不事法度。《书》曰：“有众率怠弗协^⑩。”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⑪，于是诛锄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纷乱。故记曰：商人先罚而后赏。至于桓、文之事，则又非皆任刑